

新译校注

《蒙古源流》

萨囊彻辰 著
道润梯步 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 译 校 注

《 蒙 古 源 流 》

萨囊彻辰 著
道润梯步 译校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 呼 和 浩 特

责任编辑 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 刘嵩柏

新译 《蒙古源流》
校注

萨囊彻辰 著

道润梯步 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00千 插页：2

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60册(平)

1—1,540册(精)

统一书号：11089·36 每册：(平)1.75元

(精)2.85元

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序

《蒙古源流》成书于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作者是鄂尔多斯部的萨囊彻辰洪台吉。其书写成后，展转抄录，广为流传于蒙古地方。在这过程中，不但书的内容方面发生了变化，有了出入，而且连书名也颇不一致起来。有的抄本名之为 [ha:d-un-undusun-nu ərdeni-in tobγia:]（罕统宝鉴），有的抄本则简称 [ərdeni-in tobγia:]（宝鉴），而有的抄本则更称之为 [ənəthəg tēbed mōngol ha:d-un γagan tēguhə nertu tūgudzi]《印度、西藏、蒙古诸罕源流》。这里把 [γagan tēguhə] 一词，往往按字面译成《白史》或《白册》，这与把 [γagan sar]（正月）译成“白月”，把 [γagan tologai]（蒙文字母）译成“白头”一样的荒谬。

此书汉译本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或简称《蒙古源流》。尽管译文中有很多问题，但这书名的译词却是很好的，即突出了书的主要内容，也照顾了其全面关

系，不但是贴切的，而且是美丽的。

本书到清乾隆年间译成了汉文。关于这个问题，在陆锡熊、纪昀、孙士毅、陆费墀等人上疏乾隆皇帝的钦定本《提要》中说：“臣等谨案钦定《蒙古源流》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奉勅译进，其书本蒙古人所撰……书中所纪，乃额纳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传世次序，及供养诸大喇嘛阐扬佛教之事。而其国中兴衰治乱之迹，亦多按年牒载，首尾赅备，颇与《永乐大典》所载《元朝秘史》体例相近。前者我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温得姓所自，必史乘传讹，询之定边左付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因以此书进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数百年之承讹袭谬，得藉以釐订阐明，既已揭其旨于御批《通鉴辑览》，复以是编宣付馆臣，译以汉文，润色排比，纂成八卷。”又说：“……作书者仅据传闻录之，故不能尽归确核。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灼见，自不同历代史官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妄加纂载，以致鲁鱼谬戾，不可复凭。得此以定正舛讹，实为有裨史学，仰为我国家万方同轨，中外响风，蒙古诸部久为臣仆，乃得以其流传秘册，充外史之储藏，用以参考旧文，尽却耳食沿讹之陋，一统同文之盛治，洵亘古为独隆矣。乾隆五十四年二月。”

张石州先生的《蒙古源流》书后云：“此书但详顺帝以下汗之子孙，而太祖诸弟子孙不及也。汗之子孙亦但详汗及鄂尔多斯、巴尔斯博囉特二支，而达延汗其余诸子不及也。其中写之最详者，为阿勒坦汗及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二人，而余人亦不及也。然汗之传位世系则已较然明白，鄂尔多斯之所以独详者，以汗即卒于八白室前，鄂尔多斯则为汗守御八白室之人也。然考《明史·鞑靼传》其为边患甚者，大约亦不过此三支，其东部炒花，则太祖诸弟子孙。所谓土蛮，则又达延汗诸孙之南徙近边，今为内扎萨克教汗、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诸部是也。明人治边，尚不乏才，至于纪覈源流，审正名字，则殊草草，如达赉逊之为打来孙，库图克图汗之为虎燉兔王子，犹不过译字之变，不为讹舛，最可笑者，巴尔斯博囉特之衮必里克为鄂尔多斯济农。济农职名也，明人译济农曰吉囊，不为失也。乃不以为官号，而以为人名。及衮必里克之子嗣为济农，以为不应父子同名，则曰吉囊子吉能，亦可谓不考之甚矣。今据此书表出，而后《明史》言蒙古事者，乃略皆可读。暇当更为大事表，以著其剗抚之略，而有明一代蒙古史乃可考云”。

沈曾植先生在其《蒙古源流笺证》卷一之题注中云：

“此书自《四库》著录为《却特史》，学者视之与《脱

必察顏》声价等，顾自嘉定钱先生以来，徐、龚、张、何，以及近时李、洪诸家，于《秘史》、《亲证录》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独此书仅各就可资证佐者，摘取断章，未有综其全书而理董其绪者，今略就所知者笺之。癸丑用王氏抄本，校一过朱笔，诸氏本从满、蒙、汉三文合刊本录出，又胜王氏，今多从之。”云。

张尔田先生校补云：“案先生此书，手稿丛残，无序、跋。仅于夹叶中得此数语，截之题首。又此书参校众本，不苟从一，今悉以文津阁本审正，然阁本已非满、蒙、汉三文合刊之旧，颇疑进呈初译与副阁所藏，写官重缮，或有异同，诸家展转传抄，未必同出一源，仍两存之。择善而从，亦先生例也。”

他在其《蒙古源流笺证》校毕记中云：“辛未春，郊居多暇，参校遂补数过，霑溉之益得未曾有。先生此书，原名《事证》，今改题为《笺证》，命胥录此净本，写成后，又增订数事，虽于蒙文大格，然以较通行诸本，则有间矣。闻广内所储满、蒙两本，均在故宫，恨未能一一覆勘，又殊方治蒙史者，近亦多致力于此。稽合外译，频开前失，学问之道，如积薪然，前辈之潜研，后贤之潜发，各有弘美，不妨并存，或有出于斯笺之外者，容再补之。”

他又在其《蒙古源流笺证》序文中云：“奇攸氏之立国也，鞭笞六合，混一中夏，及其遁荒部落雄长，仍不失为大国，巴图蒙克以中兴余烈，据喀尔喀全部，又逾大漠，东蹶察哈尔，西蹂青海，南收鄂尔多斯，土默特诸鄂托克，子孙繁衍，传世百年，以论于林丹汗，与明运相终始，故自来治元故者，仅有《脱卜察颜》及西域拉施特诸人书，而爱猷识理达腊以后，小王子传次，但于《明史·外国传》略存梗概，蕃、汉隔阂，语焉不详，諏朔方文献者瞢焉。

乾隆中，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始以此书上于朝，馆臣奉旨译成今书。其书根据《红册》《黄册》七种史料而成，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传统之世系为纬，而又上及蒙古种族发源之土伯特，额纳特珂克遗闻坠掌，粲然毕载。论其声价，实不在拉施特书之下，乃自入秘府，承学之士，病其音译，歧瓦罕或，津逮道、咸之交人，尚畴史、魏默深、张石州、何愿船诸君，始渐有援引及之者，嘉兴沈乙龠先生与洪文卿、李芍农二侍郎，同治西北舆地之学，而以此书研核尤勤，洪、李书行世最早，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先生既归道山，余始与亡友王忠愨相约，为之理董。未几，忠愨应召入都，勿勿又数年矣。

今年先生哲嗣慈护兄出遗书，属编次，因检校逸录，定为笺证八卷，皆杀青可，缮写间有一得之愚，仿郑灼写《皇侃礼疏》例，附载笺中发正，又数十百事。盖至是而荒裔弹舌之旧史，稍稍可以属读矣。

此书叙述繁复，又经重译，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象鞮之寔，苦于不知史，而治史者，又以其难读而弃之。今之所校，阙疑尚多，固不能无待于后人继续之研寻，然筭路蓝缕之功，微先生莫为之前也。先生学海人望，异代大节，炳焉与深宁叟比隆。慈护守父书，求己志，亦无媿昭甫，而余以衰晚余生，得藉手以告于先生为深幸云。”

他在其序文后记中又说：“此书写成后，复从赵君万里，假得传录亡友王静安校本，静安自识云：乙丑重九，假沈庵官保所藏，萝楂书室钞本，比勘竟，钞本亦有脱落，然文字颇胜于此本也。永观堂记：细审其本，脱误亦与通行本同，实未大远于先生所据诸本，惟静安简端签语邗精；颇有可与斯笺印合处，今遴其稿，当及小有意者都载笺中，称王静安校以别之，原稿仍旧赵氏，辛未首夏，孟劬再记。”

据此种记载，可以看出：一、本书汉文清译本不是直接从蒙文原文译出的，而是从满文“重译”的，所

谓“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译进”者，似指满文译本而言，所谓“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核上”者，似指汉文译本而言。解决这个问题竟经十二年之久。二、不但是蒙文原文有种种抄本与刊本，满、汉文译本，也有诸种不同的抄本和刊本，而且互有出入，尚未校出一部定本。三、诸家研究的结果，虽然也已知道了汉译本与“蒙文大格”，但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四、经沈曾植、张尔田先生校勘之本，也还“阙疑尚多”，“不能无待于后人继续之研寻”。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五、至于对本书内容的评语，则毁誉并见，或是或非，应当有个正确的解释，这是需要大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日本国江实先生，在其从满文译出的日译本序文中，评本书谓：“与《元朝秘史》共为蒙古文学之双壁。”这个论断，也许是有理的吧！不过这两部书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其主导思想而论，《蒙古秘史》是胜利进军的凯歌，而《蒙古源流》则是亡国后之哀音，以其为凯歌，故有豪语，以其为哀音，故有微言。豪语易知，微言难明，兹试举例说明，则：

一、蒙古史学自从《阿拉坦合罕传》出世之后，经大、小《黄金史》；《大黄谱》等史作，均以梵、藏为蒙古之先，佛教为蒙古之神。于是《蒙古秘史》之史统为之一变，而到《蒙古源流》乃集其大成了。就其远

因，则为忽必烈之国师，红教喇嘛帕思巴所著《彰所知论》之影响所渐，察其近由，则是阿勒坦合罕信奉宗喀巴黄教的结果。书中所反映的情况。虽可说是一种社会思潮，但也与作者们个人的知识程度和思想状况有关。其中萨囊彻辰先生是很突出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难以得出身为佐国大臣的萨囊彻辰先生但凭迷信思想来写书的结论。看来他似乎是在有意地制造这种《祖业神传论》，神传的东西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侵犯者便有罪。那么，其所指的主要对象，自然就是满清统治者了。

二、本书所叙述的成吉思合罕的事迹，是很不符合史实的。主要是：有以传说代替历史的倾向，而且阿尔噶逊弓箭手的致词是警告性的，与哈萨尔关系的记述是离间性的，所记征唐古特的事是诬蔑性的，描写其死后的哀鸣情状是绝望性的。略符合史实的部分，也是混乱不堪的。这种情况不禁令人要发问：为什么写成了这个样子？看来这里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作者所依据的史料内容有关，另一方面，在大清王朝方兴未艾的那个年代，要正面阐述成吉思合罕的事迹，是有其困难的。征金的事固不可言，西征问题也就不好说了。索性把南征北战的历史一概抹掉，颠三倒四地写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了事。至于其后继者斡歌歹、蒙哥、忽必

烈等人的事，更只好说两句佛法，轻轻点卯而过。到了张尔田先生们生活的时代，就可以说“鞭笞六合，混一中夏”之类的话了。

三、《提要》中说：“以明太祖为朱葛，任至左省长官，谗杀托克托噶太师，遂举兵迫逐顺帝，亦为凿空失实。”以朱葛为明太祖，也过于直观。这其中似乎有别的文章，按蒙文原文“〔*čugə*〕音近〔*čəgun*〕（东）”，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书中的朱葛诺延，即东方老爷了。这里似乎是在借朱明之姓氏为掩盖物。实指自东方兴起之满洲族而言。所谓“任至左省长官”的“左省”，按蒙文原文应为“东省”（或东部地方），这似暗指其夺取东蒙的事。书中所谓杀托克托噶太师而又领右省者，似暗示其又夺取西蒙的事。其南下而复归者，似影射其征服内地而凯旋之事。总之，假借说元、明间事，实指满洲人之灭蒙古国而言。

诚然，在《黄金史》和《大黄谱》等书中，也有关于朱葛故事的记载，这与该书的成书年代有关，如果是书成于天聪、崇德年间之后，就与本书的性质相同了。而且似乎影响了本书的内容。

四、书中所记载的托欢·帖木尔合罕失位北奔时，所低吟的哀叹诗，亦似后人假托之作。因为诗中总是把大都北京的丧失和上都开平的失落并提，但实际情况并

不如此。明兵推翻元朝之后，虽有北征之举，但蒙古人并未长期丧失开平城，仍旧掌握在所谓北元的蒙古国手里。到了林丹合罕失国于满洲人之际，蒙古人才失去其上都开平城。所以，把这个史实说成是元末明初的事，显然是在借题发挥，以述其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思想。从历史上的蒙古族统治集团来说，失去大都和上都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上都可谓蒙古人的故土，而大都则是得而复失之地。还有一层，这里的叙事有陋笔，微言不微，露了马脚，这是很危险的。

五、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元亡之后，蒙古内部混战的历史，再用重笔阐发了满都海彻辰夫人统一蒙古国的丰功伟绩，前后情势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这里反映着作者反对分裂，反对内战的思想。而且，单说其功绩，讳言其死亡，这无异于在呼喊：满都海彻辰皇后万岁！但这话是不能明说的，因为她的事业一“万岁”，清兵就打不进来了，蒙古国也就不会灭亡了。这是在作无字的文章，可称为本书中的妙笔之一。只可惜：叙事过于简略，比诸《黄金史》的记载，也稍有逊色。

六、书中对林丹合罕的事迹，说得也很简略，但用深刻的文字，形象的比喻，主要从主观方面总结了亡国的惨痛教训。说：“大军怒则毁其政，大象怒则毁其城。”言止于此，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才是：昆山玉碎

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一隐一显，两态并作矣。好象使人看到了流泪的怒目，可称为绝妙的奇文。不过把“香兰”二字改为“令兰”则更合乎了。这里手提令剑的人是谁？也无须多说。

七、书中叙罢蒙古国灭亡的历史之后，紧接着突如其来地说了一段明王朝的开国、传承和覆亡的历史。不言明兵之北征和蒙军之入关。而表示它与元皇室有着某种亲戚关系，学者们多感到文章突兀。但是在我看来，这里也似有文章，它是在总结明、蒙两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经验和教训。正如张尔田先生所言，“与明运相终始”的问题，希望双方记取这一如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惨痛教训，来共同反对这个敌国之“渔人”。

如此等等。总之，《蒙古源流》是一部在叙史的明文中，寓其论政的微言，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反对满清统治的著作。但在当时，他这事是不会成功的。到了后来，已没有这种必要，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号称“圣明天子”的乾隆皇帝及其翰林院的学士们，似乎没有看明白这部书，如果是明白了，他们就不会翻译和刊行的。后来从事研究这部书的中外学者们，似乎也没有看明白。当然，我的认识也不一定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至于说我这个《新译校注》本，所谓“新译”是对

清译而言。如上所述，汉文清译本不是直接从蒙文译出的，而是由满文译本“重译”的。看来，满文译本的问题似乎不多，但汉文译本的问题是很多的，大约全书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都是错误的，如果不对照蒙文原文就无法读得懂，这就是所以要“新译”的原因。所谓“校注”是指校正王静安、沈曾植、张尔田等先生注释文而言。诚然，先生们研究并注释了这部书，是有很大功劳的，但也有不少问题，这里有三方面的情况，一是：部分注文是错误的，作了力所能及的校正工作；二是：部分注文由于新译的结果，自然变为无用而被淘汰了。但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注释条文，也许有不当之处，还需要研究；三是：部分注文是可用的，但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用张尔田先生的“今且存而辩之”的方法，保存下来了。我研究《蒙古源流》的时间很短，从词句到内容，都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先译出来，以应急需，愿与诸同人共同研究。

这部书的真正科学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首要问题。如果说《蒙古秘史》是从氏族制向奴隶占有制转化过程的记录，那么《蒙古源流》的主要部分则是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转化过程的记录。《蒙古源流》的价值在其后半部，前半部的一、二卷，对蒙古史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三、四卷中也缺乏科学性的资料。所以

要说明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单靠本书的记载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元史》。

《元史·卢世荣传》中云：“至元二十年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世荣辩，论所当为之事”，“又奏……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帝曰：“汝先言数事皆善，固当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时亦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世荣因奏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汝无防朕，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急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汝之职分既定，其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这里所谓“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就是封建生产关系。也就是我所说的“苏鲁克制度”的先导。对此忽必烈说的颇为有趣，他说：“此事亦善，祖宗时亦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这里不但表明了他要推行这条政策的意图，而且把以前的情况也说清楚了。卢世荣败亡后，未闻废除这一政策，所以蒙古史的进入封建主义时代是从元代忽必烈当政时开始的。

当然不能说元廷提出个政策，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有其自己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但这时毕竟是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元代的皇室内江中，似有新旧两种制度相互斗争的因素。据本书所载，元亡后蒙古内部的长期混战，有新兴封建领主制与旧的奴隶占有制之间相互斗争的性质。到了达延合罕时代，封建领主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占据了统治地位。

张尔田先生在其《蒙古源流笺证》的序文中所说：“巴图蒙克以中兴余烈，据喀尔喀全部、又逾大漠，东踰察哈尔，西踰青海，南收鄂尔多斯土默特诸鄂托克，子孙繁衍，传世百年”者。其实这不是什么“中兴”的问题，而是新兴封建领主制战胜原来的奴隶制的问题，其代表人物也不是巴图蒙克，而是其年长之后满都海彻辰夫人。

满都海彻辰夫人是位女英雄。她极力卫护将被废弃的成吉思合罕皇统，斥责不臣，亲临战场，指挥兵将，自为先行，冲锋陷阵，为统一其七零八落的蒙古国，为封建领主制的普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我们应当予以肯定的评价。诚然，成吉思合罕的事业比她的事业大，但其过错也多。她的事业比成吉思合罕的事业小，但其过错也少。按本书中记载的事迹看，她似乎没